

算法凝视：具身智能时代的交往异化及其应对

张淑华

摘要：具身智能根植于“感知—认知—行为”闭环与物理情境的持续互动，正驱动一场深刻的交往革命。然而，在数字资本主义的逻辑下，技术应用并未导向交往解放，反而催生了交往异化的新形态。对此问题的批判不能仅限于技术伦理层面，必须深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内核，审视交往实践本身的质性蜕变。在“算法凝视”下，具身智能时代的交往异化呈现出四重表现：作为交往媒介的语言被工具化、作为交往情境的空间被规训化、作为交往内核的情感被商品化，以及作为交往目的的价值被资本支配。为扬弃具身智能时代的交往异化，应在技术向度上充分挖掘具身智能的解放潜能，在制度向度上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打破资本对技术的垄断，在主体向度上培养个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促成“数据连接”向真正“人的联合”转变，进而将技术革新转化为交往重塑与人的解放力量。

关键词：算法凝视；具身智能；交往异化；主体性；资本逻辑

中图分类号：C91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26)01-0013-10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经历从感知智能向认知智能、从虚拟智能向具身智能的深刻范式转变。具身智能作为这一转型的核心方向，挑战了传统人工智能所秉持的“离身认知”预设。它不局限于虚拟空间的符号计算和信息处理，而是通过具备物理实体的智能系统实现与物理世界的实时交互。它强调智能行为源于智能体与环境之间持续不断的感知与行动循环，是一种嵌入身体、嵌入情境、嵌入互动的智能形态，并由此得以嵌入人们日常的交往实践之中。随着具身智能从技术前沿渗透至广阔的社会场景，其应用实践日益嵌入人类交往的深层结构，深刻重塑着人际互动的基本样貌。交往关系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人与人，而是扩展为人机共存、人机交融的新形态，甚至交往过程本身也开始被技术架构所预先规制。已有研究警示，在数字资本主义逻辑下，技术使用者极易被整合进“数据捕获—算法驯化—价值榨取”^[1]的生产链条。这一过程，正是本文所要剖析的核心症候——“算法凝视”。所谓“算法凝视”，“正是算法对个人数据进行意义加工的过程”^[2]。在具身智能语境下，这一过程具体体现为智能系统通过整合多模态传感器数据，对个体物理动作、微表情和交往行为进行实时监控、分析和塑形的过程，从而实现对人的全方位透视和规训。它并非中立的技术功能，而正是资本逻辑在数字时代的技术化身。在这种无所不在的凝视之下，交往主体从自在目的被重构为一种可供榨取的工具性存在，因此，其劳动过程与交往行为的自主性与真实性遭到了系统性的侵蚀。

总体来看，学术界已有成果主要聚焦于数字交往异化的多重维度，涵盖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数字交往形态的总体性阐释^[3]，聚焦人机对话及其功能特征^[4]，解析数字技术与资本逻辑合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与文明贡献研究”（24&·ZD022）

作者简介：张淑华，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33220240157258@stu.xmu.edu.cn（福建 厦门 361005）

下交往异化的生成机理^[5]，亦不乏对人与社会关系重构的批判性反思^[6]。然而，这些富有洞见的探讨，批判的焦点多集中于数字交往异化的宏观成因与社会后果，而对于数字交往实践“内部”发生的结构性病变，缺乏一个系统性的诊断框架。这一理论上的局限在面临大模型与具身智能结合为代表的人机交互新范式，显得尤为突出。为回应这一挑战，本文立足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构建一个旨在剖析交往实践内在质变的分析框架，深入考察具身智能时代的交往异化在语言、空间、情感与价值，即交往媒介、交往情境、交往核心和交往目的四个维度的具体表现。最终，本文尝试从技术范式重塑、生产关系变革与交往主体重建等层面探索扬弃异化的解放路径，以期为构建良善的人机共存社会秩序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观照。

一、理论谱系：作为交往批判的马克思异化理论

在具身智能技术日益渗透并重构当代交往秩序的背景下，理论建构应以重新审视异化的概念内涵与实践指向为逻辑起点。系统考察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不仅在于厘清“异化”从神学、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演进，更在于揭示马克思本人思想体系中从“异化的历史观”向“历史的异化观”的关键性范式转换。一种真正具有穿透力的分析框架，必须超越单纯的劳动异化视角。如日本学者望月清司所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实则是劳动异化与交往异化辩证统一的整体。正是这一整体性视野，使得马克思的理论在与霍耐特、耶给等当代批判理论家的对话中，依然保有更卓越的制度批判深度与存在论厚度，从而为剖析算法时代的交往困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一）概念厘定：从精神异化到交往异化

在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中，异化被用来阐述主客体的特殊关系。费希特认为客体是主体“异化”的产物。而黑格尔首次将“异化”提升为核心的哲学与存在论范畴，泛指“精神实体作为主体自身的分而为二即自身对立化或产生自身的对立面”^{[7] (P681)}，这种异化是观念性的，最终只能在绝对精神中被“扬弃”。在批判黑格尔的基础上，布鲁诺·鲍威尔提出“自我意识”异化，但仍未跳出精神范畴，遮蔽异化的现实性与属人性，未能将异化问题落实到现实社会关系之中。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时继承并改造了异化概念，认为宗教异化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然而他的批判亦未能触及产生异化的现实社会活动。

这些思想为马克思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将异化问题从抽象的哲学思辨历史性地转变为对现实生产关系，即最基础的社会交往形式的剖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的四重异化状态。其一，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其二，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其三，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其四，人同人相异化，人际关系被物化为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社会关系。这四重异化共同构成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整体性异化结构，尤其是人际关系的异化，标志着异化开始从生产领域渗透至社会交往本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几乎同时期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将批判的锋芒进一步指向了社会交往领域。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将交往（Verkehr）的本质界定为一种不借助任何中介的、直接的人格间关系，并将其视作“人的本真形态”^[8]。但在市民社会中“人格之间的交往只有借助于私人所有和货币这样的中介才能完成，结果使人格与人格的关系表现为物象和物象之间的交换关系”^[9]。这种状况已然背离了交往的本质，马克思将其命名为“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10] (P25)}，最早提出“交往异化”概念，这为我们理解当代技术中介下的交往异化提供了最直接的文本依据。

基于《穆勒评注》及相关文本，可以提炼出判定“交往异化”的三个相互关联且层层递进的核心维度。其一，交往媒介的物化。当人与人的直接关系被物化为以货币为代表的交换关系时，

“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倒成了完全符合于理所当然的、自信的和自我认可的人类尊严的东西”^{[10] (P36)}。这种异己的媒介不仅阻隔了交往形式的直接性，而且也削弱了人的主体地位。其二，交往主体客体化。随着交往中介的外化，物的中介跃升为交往关系的主导，交往主体从关系的能动建构者沦为被既定规制支配的客体，社会关系由此发生根本性倒置。其三，交往目的工具化。在异化的交往形态中，交往不再以自我确证和人的自由发展为目的，而是服从于外在的交换或增殖逻辑，这意味着交往本身的意义被吞噬。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这些个人是怎样的，这种社会联系本身就是怎样的”^{[10] (P25)}，交往的目的也随之发生根本转变。这些核心要点不仅构成了交往异化的基本内涵，也为从不同维度分析当代社会中交往异化的具体样态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判定标准。

（二）异化根源：资本操控下社会关系的全面物化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科学性嬗变，表现为从青年时期的人本主义的“人的本质”异化批判到成熟时期对资本及其增殖逻辑的唯物史观剖析。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与《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异化并非仅仅源于私有制或货币中介的存在，更源于资本对技术的占有。在这一视角下，异化的根源被精确地指认为资本对“一般智力”的占有，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关系全面物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11] (P90)}，马克思称之为“商品拜物教”。而这一机制又衍生出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遮蔽了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这种物的关系造成了交往异化的核心表征，即物的主体化和人的客体化。

从技术维度看，这一异化机制集中体现为“死劳动”对“一般智力”的支配。在《大纲》的“机器论片段”中，马克思提出了“一般智力”^{[12] (p198)}概念，是“社会主体智力长期发展和经验积累的结果”^[13]。本应是促进人类解放的科学知识，但在资本的规制下，被固定为“自动的机器体系”^{[14] (P90)}。由此，“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15] (P385)}，这带来了双重倒置关系。其一，智力权力的倒置。机器体系作为一种对象化的“一般智力”，被纳入资本增殖过程，转化为与活劳动对立的异己权力，压制工人的智力发展。其二，主客体关系倒置。活劳动从属于死劳动，工人沦为机器体系“有意识的器官”^{[11] (P483)}。“一般智力”转化为具有社会支配力的机器体系，并重塑社会交往格局。

从资本操控交往维度看，异化不再局限于生产领域，而是沿着交往媒介、交往主体与交往目的等维度，扩展至社会交往领域，使交往不断趋向抽象化与物化。其一，交往空间的同质化与可计算化。资本为了让空间更好地服务于资本增殖将其同质化为可计算空间。马克思将生产空间描述为适应机器生产而非人体自身的“苦难窟”^{[11] (P564)}，人们的肉体和精神都受到资本的支配和控制，这种规训逻辑延伸至生活空间。其二，交往时间虚无化。人的生命时间被分割为“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而闲暇时间又被消费主义所占领，服务于资本的再生产，“全方位达成对工人的时间规训”^[16]。其三，交往关系冷漠化。随着资本宰制社会关系，感性温情的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为“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17] (P34)}。这种主体间性的断裂，将成为技术中介全面入侵情感领域的缺口。

总之，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当代技术文明，特别是具身智能全面渗透社会交往的语境下，亟需重新激活异化理论所内蕴的批判能量。如果说工业资本主义下的异化体现为“死的物质对活的生命力的统治”，那么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统治已然变异为一种更为内隐和深刻的形态。异化不再仅仅是工厂机器对身体的规训，而是延伸至算法逻辑对交往实践乃至主体心智的全面殖民。正是这一全新的历史情境，通过对交往异化概念及其社会根源的分析，为我们判断交往异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标准，从而使我们更好地深入具身智能的内在机理，解剖其在语言、空间、情感及价值所引发的全新异化形态。

二、表现样态：具身智能时代交往异化的具体特征

具身智能作为“一般智力”的最新对象化产物，在技术本性上具备着拓展主体感知与行动边界，促进自由交往的解放潜能。然而，技术本身并不必然导致交往异化，其效能取决于它从属于何种社会形式。在资本逻辑主导下，这种解放潜能与异化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深刻的辩证张力。资本借助算法将复杂的社会交往转化为可计算、可预测、可控制的流程。由此，在这种无所不在的“凝视”之下，技术中介从促进交往的工具，转变为支配交往的异化力量。这里的核心判据在于主客体关系是否发生倒置，即交往实践是否偏离了人的自我确证逻辑。以此为参照，具身智能交往异化在语言、空间、情感与价值四个维度上，呈现出更为深刻的表现样态。

（一）语言异化：从语义丰富到人机隔阂

具身智能深度介入社会交往的背景下，语言这一交往媒介发生了显著变化，凸显了机器语言与自然语言的本质差异。马克思认为语言是“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8] (P34)}，是在交流与创造中逐渐积累并丰富起来。具身智能语言则依赖于大规模数据集的训练与模拟，强调规范性、可计算性与数据驱动。然而，当人们为了更高效地反馈而自觉适应机器语言时，人便从语言的主人异化为算法语料的生产者。此时，自然语言物化为标准化的算法语言，算法中介阻隔人与人之间直接且有意义的交往。

具身智能的语言交互更深层地依赖于数据规律的机械模仿，而非真正的理解，这在人机之间划开了一道深刻的语义鸿沟。从鲜活经验到标准化数据来看，以医疗问诊机器人为例，在问诊过程中，患者将自己丰富的具身感受“客体化”，以迎合系统的理解框架。在这一过程中，患者从一个寻求理解的交往主体，降格为一个被审视和分析的数据对象。从认知科学的视角来看，这种鸿沟源于人类依据日常经验构建的常识性概念描述，与计算机所运用的语言概念之间的根本性差异。有研究指出“具身智能模拟人类通过‘身体’进行认知的方式存在明显的概念互通问题”^[19]，这导致人类语言与机器语言的交互存在不可避免的理解障碍。

语义鸿沟在具体的交往实践中，进一步固化为现实的交往隔阂。一是语境理解障碍。在现实任务场景下，具身智能需要将自然语言指令精准解析并转化为可执行的动作序列，这使得跨模态语义对齐问题变得尤为复杂与紧迫。由于机器“缺乏体验和意义的先决条件”^[20]，难以通过真正的社会体验与新陈代谢来自我进化，因而难以动态捕捉并适应人类语言中高度语境化的语义流变。二是主体间性的缺位。在语境理解受限的条件下，人类与机器人之间也难以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主体间性”与共享的社会语境。这正是交往媒介由主体间真实的语义理解转化为物化中介在语言层面的最直观呈现。

（二）空间异化：从自由交往到算法规训

语言媒介的异化必然延伸至交往空间的重组。具身智能通过提供全时段在线、高度定制化的“完美陪伴”，构建了一个无压力的拟态理想交往空间。然而，这恰恰是资本逻辑掩盖下的交往陷阱。在这种空间中，交往不再是主体间自由敞开，而是被深度学习与反馈机制所引导和塑形。用户为了获得最佳反馈，往往自觉地按照算法偏好调整自身行为，构成了从自由交往到算法围猎的“空间异化”。

交往空间的算法化使主体逐渐丧失关系建构的主导者身份，沦为被支配者。智能技术虽克服了时空限制，但在资本操控下，本应作为“中介”连接你我的技术，正被异化为操控行为、榨取价值的工具，反而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真实交往的疏离。这种交往规范失序最危险的后果，是人与机器之间主客关系的颠倒。本应是服务于人的工具，具身智能正凭借其超强的知识储备、情感呼

应和模仿能力，从被动的媒介转变为主动的、具有支配性的交往对象。这印证了马克思的洞见：“在你心目中，你的产品是占有我的产品从而满足你的需要的工具、手段。”^{[21] (P36)} 服务于主体间交往需求的劳动产物即交往工具，在特定条件下会偏离其本质，从沟通中介逆转为控制性力量。用户在与具身智能的互动中，会不自觉地赋予其主体地位。

伴随VR等虚拟技术和具身智能的不断融合，将极有可能实现虚拟与现实互通，人们的交往空间将被算法全方位宰制，人的自我认知也随之异化，社会关系被简化为纯粹的数据关联，这严重背离了人的社会属性本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源自个体的肉体感受性以及真实的社会交往活动。一旦脱离现实交往所具备的鲜活、真实与确切的特质，人的本质就可能陷入被抽象事物如同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或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货币”所操控的困境，最终导致人类主体性的沉沦。在这一过程中，空间异化是交往主体客体化的具体表现。

（三）情感异化：从主体间共鸣到情感商品化

情感作为一种“具身性感受 (Embodied Perception)”^[22]，是肉体与灵魂相结合产生的真实生命体验，也是主体间理解、共鸣、相互确证的纽带。然而，在具身智能与资本的统摄下，主体倾向于与无意识的机器客体交流，导致情感对象的倒置。更深层次的异化在于，情感被纳入资本增殖的过程，主体在与机器的互动中难以寻求到真实慰藉以实现自我确证，反而这种情感体验转化为计算化、商品化的情感劳动。

情感异化的第一步，便是用技术化的模拟悬置乃至取代这种真实性。具身智能通过算法生成符合逻辑的回应，却无法触及在复杂现实中、由共同生命体验生成的真实共情。以养老场景中的具身陪伴机器人为例，相关产品能够营造出一种高度拟真的“共情”假象。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滚烫的情感将无一例外地被转换成数据，进而结成一串串无辨识度的、同质化的冰冷符号”^[23]。当人们习惯于将情感投射到这些智能体上，而未能清醒认识到其情感仅是算法模拟时，技术的“物性”本质便会遮蔽甚至否定人的现实性。这种误判是危险的，它将侵蚀人类作为生命体的独特性，最终可能导致人类整体情感能力的退化。

情感异化由此走向其致命的第二步，在资本增殖逻辑下，情感的内在体验被贫困化，从而转化为一种可被估价、生产和消费的“情感劳动”。在这种异化之下，“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异化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自由、平等、真诚、自主的交往异化为丧失价值与尊严的物的关系或金钱关系的交往”^[24]。情感的去真实化、货币化和空虚化使其丧失了原初功能，不再是纯粹的心理体验和主观意识的表达。在“算法凝视”下，用户的每一次情感互动都被精确地量化为可供分析的数据。这些数据成为训练模型的养料，成为提升用户黏性的指标，最终成为可供交易的商品。在此过程中，情感被纳入资本增殖与技术优化的逻辑中，不再以自我确证为目的，此异化形态是交往目的工具化的集中体现。

（四）价值异化：从AI对齐到技术悖论

由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引领的“超级智能”时代正加速到来，关于具身智能的价值对齐成为技术伦理治理的核心议题。波斯特洛姆曾警示，“在人类与超级智能的差别面前，人类内部的认知能力差别是微不足道的”^{[25] (P92)}。为规避超级智能目标偏离带来的风险，“AI对齐”旨在确保人工智能的目标与人类的伦理规范保持一致，并将保护人类生命安全作为设计的“硬约束”。然而，这种技术主义的治理方案并未触及异化的根源。真正的价值异化在于，资本逻辑主导下，具身智能倾向于将工具理性置于人类的价值理性之上。我们试图创造遵循人类道德标准，为人类所用的智能，结果价值地位却发生根本性转移，主体从价值判断的决定者颠倒为被算法评估与优化的客体。

可见，“AI对齐”这一技术理想面临着深刻的悖论，交往目的在价值层面发生了根本性异化。

正如人工智能先驱斯图尔特·罗素所指出的，“人工智能研究主要聚焦于提升决策能力的系统，但这并不等同于做出更优的决策”^{[26] (P22)}。更为严峻的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所谓的“AI对齐”理念被系统性地扭曲，沦为服务于资本增殖的工具。原本旨在服务于人类福祉的价值对齐，被重新定义为服务于资本逻辑的剥削对齐，即通过海量数据收集实现监控、算法引导和制造消费，从而更高效地榨取剩余价值。学者肖莎娜·祖博夫深刻地揭示了这一逻辑：“我们不过是他人实现目标的工具。”^{[27] (P203)}这就形成了一个尖锐的矛盾，一个在技术上越是“对齐”资本目标的具身智能，在社会层面上造成的异化就可能越深重、越难以察觉。至此，交往不再以人的自由发展为目的，而是成为资本逻辑的附属，进一步体现了交往目的在价值层面的工具化。

总之，语言、空间、情感和价值异化是交往媒介物化、主体客体化、交往目的工具化在具身智能时代的集中表征。无论是语言模型因缺乏对“意义”的理解而随机模仿并放大训练数据中的消费主义偏见，还是情感计算被异化为资本增殖的数字劳动，都揭示了人工智能并非纯粹的技术，而是如凯特·克劳福德所言，“旨在服务于既有主导利益”^{[28] (P8)}的庞大社会技术系统。单纯的技术或伦理“补丁”无法解决由社会结构性矛盾引发的异化问题。真正的扬弃，必然要求我们超越单纯技术改良主义的设想，去触及并变革其背后更根本的生产关系。

三、扬弃路径：具身智能时代交往异化的重塑方案

以具身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一方面前所未有地延伸了人类交往的能力与边界，另一方面也使其陷入了新的困境。在资本追求效率与增殖的内在驱动下，人与具身智能乃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被工具化、商品化，呈现出多重异化的样态，不仅偏离了交往的初衷，更对社会关系构成了潜在挑战。面对这一困境，需通过技术、制度、主体三个层面的协同作用，才能系统性地抵御和消解交往的异化形态，迈向一个技术服务于人、交往回归本真的具身智能新时代。

（一）技术改良：辩证检视具身智能新趋势

面对具身智能引发的异化危机，技术系统正展现出一种内生性的自我优化趋势。一方面，随着大语言模型赋予具身智能以强大的泛化认知“大脑”，以及世界模型（World Model）在物理环境交互上的突破，机器正借助记忆机制与反馈控制，在技术层面弥补人机交互中的语义鸿沟与“幻觉”现象。另一方面，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RLHF），借助强化学习算法，试图将人类偏好融入奖励模型，更好地实现算法行为与人类意图和价值观的对齐。然而，单纯依靠技术内部迭代的改良方案，难以使具身智能回归“劳动资料的本质属性”^[29]，更难以解决交往异化。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本质绝非任何技术的事物”^{[30] (P123)}。当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RLHF）将价值判断降维为可计算奖励函数，它并未真正理解人类的道德标准，反而迎合人类偏好以营造一种伪理性的交往空间。

要实现交往异化的根本扬弃，需对具身智能本身祛魅，但这也只是必要条件之一。首先，推动具身智能从“技术神话”转为“透明中介”，通过技术手段打开“算法黑箱”，“嵌入有利于多元交往的算法”^[31]服务于人类福祉。其次，建立可解释性机制，准确理解环境和指令，使人类清楚知道“感知—理解—决策—执行”的逻辑链条，提升算法可信度与可解释性。最后，在算法设计源头设立“人是目的”原则，嵌入可干预性机制，为人机互动划定伦理边界。只有确保具身智能算法的安全性，才能保证具身智能是增强人类能力的工具，使其回归工具本位，从而阻断交往媒介物化。但要注意的是，若具身智能依旧是资本增殖的中介，这些技术层面的改良容易被吸纳为资本的优化手段，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延续语言、空间、情感与价值层面的交往异化。

（二）制度变革：打破资本对算法的垄断

从制度层面合理驾驭资本，限制资本对具身智能的无止境宰制。马克思曾深刻指出，“资本越来越具有物的形态，越来越由一种关系转化成一种物”^{[32] (P341)}。在具身智能时代，这一异化升级为“数据—算法—智能体”的三重物化。资本通过对这三重媒介的垄断，将活劳动降格为冰冷的、可量化的“数据连接”。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变革打破这种垄断。

第一，变革生产关系，推进平台数据共享机制建设。一方面，依托隐私计算等技术手段，实现“可用不可见”的数据协同利用，在保障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的前提下促进数据流通共享。同时，通过完善数据确权与收益分配制度，“从‘为他’生产转向‘为己’生产”^[33]，更好地发挥数据要素价值。通过制度设计，使异化为“算法的饲料”的语言、情感数据重建其作为“类本质力量”的尊严。另一方面，政府要构建一套较为成熟的算法伦理监管体系，而非直接干预技术配置，旨在保障具身智能交往过程中的隐私与安全需求，从而捍卫“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这一命题。

第二，规制算法权力，推动“算法向善”。针对算法黑箱对语义与情感的扭曲，立法层面应要求具身智能系统在合理范围内提升算法透明度，即用户有权知晓自然语言与情感意图是如何被转化为机器指令的，“以立法赋予用户对自身数据的自主权”^[34]。同时，必须明确软件开发人员、资本创投者以及科研机构等相关主体的伦理责任。政府应发挥敏锐的风险洞察力，积极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立法框架，推动新兴技术向善，从而更好地发挥新兴技术的积极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政府需清晰界定公权力与算法权力的边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推进算法向善方面的优势。

第三，捍卫劳动者权益，建立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具身智能的“随时随地交往”实则是资本时空殖民的升级，劳动者被迫加入自我剥削式的“内卷”中。必须提高算法透明化，破除唯效率的算法机制，科学分配任务量，帮助劳动者夺回自由时间作为发展空间，找到效率和人本之间的平衡点。法律赋予劳动者断开数字连接的权利，限定资本在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利润边界。同时，建立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使情感劳动者可以获得与情感劳动对等的工作报酬，使平台情感劳动者的社会价值和劳动意义得到应有的保障。这不仅是对“自由假象”下深层剥削机制的制度性破除，还是为了实现劳动从被迫的谋生手段向“自主活动”的转化。

（三）主体重建：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

技术的发展不仅是工具的革新，其还深刻地重塑着人的存在方式与主体性。在具身智能深度嵌入社会交往并通过算法持续塑形主体行为的情境下，扬弃交往异化，除了技术改进与制度构建，还需回归并激活主体的内在能动性，使其重新成为交往关系的能动建构者，最终指向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首先，认知上对技术进行祛魅。在资本操纵的具身交互中，主体极易陷入技术崇拜的迷思，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当我们认为技术是某种中性的东西时，我们又是以一种可能最坏的方式被交给技术了”^{[30] (P123)}。为了避免陷入技术恐慌，主体重构的首要前提是对人类主体性有清醒的认知，抵制资本对主体的占领。个体不仅要“重视数字化、智能化学习”^[35]，提升数字技能，清醒地认识到其作为“死劳动”的代码本体；还要洞察到具身智能背后的社会性，限制资本的总体化膨胀趋势，从而在人机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

其次，破除具身智能交往中的情感依赖，在现实交往实践中重构人的主体性尊严。当《穆勒评注》中“交往的相互确认”异化为“用户与算法的相互驯化”时，人的自主性被侵蚀。过度依赖虚拟情感交往可能导致连接却孤独的状态，智能产品的研发人员要考虑到用户的情感健康因素，以适应“高技术与高情感的平衡与协调”^{[36] (P300)}的时代需求。因此，我们必须撕破技术的面纱，

摆脱“技术滥交”^{[37] (P10)}, 直面《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个人”的真相, 捍卫“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38] (P211)}, 打破越连接越孤独的困境。

最后, 超越“原子化”连接, 构建“有机共同体”。具身智能虽然建立了“普遍交往”, 但往往是基于“弱连接”和“信息茧房”的原子化状态。真正的解放实践, 要求我们扬弃这种由算法中介的冰冷连接, 走向马克思所指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要求劳动者在“断开连接”的自由时间里, 主动建立和维护那些无法被算法完全量化和操控的强连接。“重视‘交谈’, 以‘面对面交流方式’”^[39], 缓解具身智能交互所引发的交往疏离, 使人的交往从异化的资本逻辑中解放出来, 实现以“共同体”的实践来超越“数据化”的逻辑。

综上所述, 重建主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使主体重新回归交往关系建构的主导者身份, 从而在人与机器的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技术改良、制度变革与主体实践的共同作用, 真正让具身智能服务于“自由人联合体”, 推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四、结 语

具身智能交往异化的多重样态, 从根本上揭示了在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三重判断标准下, 技术发展所引发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深层矛盾。“算法凝视”是资本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新形态, 它将人类交往本身改造为一座持续生产价值的“数据工厂”, 系统性地制造出一种比传统劳动异化更深刻的“交往异化”。尤其在具身智能时代, 其在“身体图式”“意向弧”和“言语姿势”的深层局限, 反而更加凸显了模拟交往与真实交往之间的鸿沟。这种异化最终导向的, 不仅是交往的危机, 还是人的主体性危机。当我们沉浸于算法构建的虚拟世界时, 正面临着被技术霸权消解自身本质的风险。然而, 问题的根源不在技术本身, 而在于其背后的资本逻辑。因此我们必须警惕技术带来的异化风险, 但更要主动把握其解放的潜能, 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与社会实践, 确保智能技术最终服务于“人是目的”的价值立场。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穿透“算法凝视”, 捍卫人的尊严, 确保具身智能成为通往“自由人联合体”的桥梁, 而非加剧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交往异化。

参考文献

- [1] 魏郡. 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休闲困境”: 资本逻辑与主体疏离的双重张力[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3).
- [2] 陈言, 顾理平. 算法凝视: 人工智能时代的隐私危机[J]. 南京社会科学, 2025(3).
- [3] 刘灵. 数字交往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4).
- [4] 肖峰. 大模型时代的数字交往: “对话中的人”及其新形态[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4(19).
- [5] 于天宇, 秦铭. 数字资本主义交往异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4).
- [6] 邱泽奇. 机器智能与社交关系重构[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4(19).
- [7] 苗力田, 李毓章. 西方哲学史新编(修订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 [8] 韩立新. 《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 马克思的转折点——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研究[J]. 现代哲学, 2007(5).
- [9] 韩立新. 评日本的“早期马克思论争”——兼论《穆勒评注》对重构马克思异化论的意义[J]. 哲学研究, 2010(9).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3]孙乐强.马克思“机器论片断”语境中的“一般智力”问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
- [1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6]聂嘉琪.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
- [1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19]闫宏秀,宋胜男.基于“认知—语言—价值”三重对齐的具身智能构建[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4).
- [20]陈伟,王栋.人工智能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哲学阐释[J].浙江学刊,2023(6).
- [2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2]余瑞丹.论情感在笛卡尔式身心关系图景中的位置[J].哲学研究,2023(12).
- [23]刁生富,陈惠.数字孪生人的伦理审视[J].哲学分析,2024(3).
- [24]陈凡,胡景谱.论“情感劳动”的异化及其消解[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
- [25]Bostrom, N. *Superintelligence: Paths, Dangers, Strategie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26]Muggleton, S., N. Chater. *Human-Like Machine Intelligenc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 [27]Longhofer, W., D. Winchester. *Social Theory Re-Wired: New Connections to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M].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 [28]Crawford, K. *Atlas of AI: Power, Politics, and the Planetary Cos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 [29]贾璐萌,赵佳欢.超越与复归:人机协作的历史演进及其双重逻辑[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
- [30][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 海德格尔语要(第2版)[M].郜元宝,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 [31]魏丽.继承与拓展:智能时代人的解放的逻辑演进与实践路径[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5).
- [3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33]于洁.数字平台劳动异化的三维透视——基于情感劳动的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25(4).
- [34]汤塘.数字资本的“生成性剥削”:现实表征、运作机理及解构路径[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
- [35]张成岗,王明玉.数字交往中的自我异化及其治理逻辑构建[J].治理研究,2025(3).
- [36]张艳涛.现代性的哲学反思与“中国现代性”建构[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1.
- [37][美]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M].周逵,刘菁荆,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 [3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9]郭洪水,张淑华.数字交往形式的异化及其应对[J].科学·经济·社会,2025(2).

Algorithmic Gaze: Alienated Communication in the Era of Embodied Intelligence and Its Resolution

ZHANG Shu-hua

Abstract: Embodied intelligence is rooted in the continuous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erception-cognition-behavior” loop and physical context, driving a profound communication revolution. However, under the logic of digital capitalism,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 have not led to the liberation of communication but have instead given rise to new forms of communication alienation. The criticism of this issue cannot be confined to the level of technical ethics; it must delve into the core of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to examine the qualitativ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cative practice itself. Under the gaze of algorithms, the aliena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era of embodied intelligence presents fourfold manifestations: language as a communication medium is instrumentalized, space as a communication context is regulated, emotions as the core of communication are commodified, and value as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is dominated by capital. To abandon the aliena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era of embodied intelligence, we should fully tap into the liberating potential of embodied intelligence in the technological dimension; and break the monopoly of capital on technology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the institutional dimension; cultivate individual autonomy and initiative in the subjective dimension;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data “connectivity” to true “human unity”, and then transfor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to the reshaping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liberating power of human beings.

Key words: algorithmic gaze; embodied intelligence; alienation of communication; subjectivity; capital logic

(责任编辑 孙洁)